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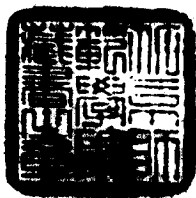
北京现代革命史

宋 柏主编



北京现代革命史

宋 柏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6962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69627

北京现代革命史

宋 柏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8, 插页5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95 000 册数: 1—5 000

ISBN 7-300-00473-3
K.52 定价: 3.40 元

17628/04

目 录

第一章 五四运动前的北京	1
一、世界著名的古都.....	1
二、鸦片战争后北京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2
三、北京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和产业工人的出现.....	3
四、北洋军阀的统治中心.....	5
五、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8
第二章 五四运动爆发和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	12
一、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2
二、“五四”运动.....	14
三、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广泛传播.....	19
第三章 北京党组织的建立和北京早期工人运动	27
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酝酿和成立.....	27
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和党组织的建立.....	31
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活动.....	41
四、组织和发动“劳动立法运动”.....	43
五、为争人权、争自由而斗争.....	44
第四章 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北京革命浪潮的掀起	47

一、革命统一战线在北京地区的建立	47
二、掀起恢复中苏邦交的热潮	50
三、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	53
四、声援上海“五卅”反帝斗争	54
五、北京郊区的农民组织和革命斗争	56
第五章 从首都革命到北伐战争	62
一、首都革命	62
二、“三一八”惨案	64
三、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69
四、北京人民支援北伐战争	74
五、白色恐怖笼罩北京	77
第六章 大革命失败后北京的政治形势与人民革命运动的恢复	81
一、大革命失败后北京的政治形势	81
二、“八七”会议决议在北京的贯彻	82
三、中共北京市委改选代表大会	85
四、北京党组织的进一步整顿	87
第七章 北平人民革命斗争的恢复和发展	93
一、党的六大后北平人民的革命斗争	93
二、30年代初期北平的左翼文化运动	99
第八章 “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反蒋斗争	103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	103
二、抗日反蒋斗争的开展	104
三、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	109

第九章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113
一、	“一二九”运动前夕的政治形势	113
二、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建立	115
三、	刘少奇到北方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	121
第十章	卢沟桥事变和北平地区的抗日斗争	131
一、	英勇壮烈的卢沟桥抗战	131
二、	革命青年走上抗日战场	137
三、	平西游击队和北平郊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141
四、	冀东暴动与北平北郊、东郊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146
五、	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的活动	148
第十一章	北平城市工作的开展和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	156
一、	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方针的贯彻	156
二、	北平政治形势的好转和工作范围的扩大	163
三、	大批干部进入北平建立地下工作据点	167
四、	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	173
第十二章	北平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斗争的新开端	176
一、	抗战胜利后北平的政治形势	176
二、	北平知识界反蒋运动的迅速展开	184
三、	北平工人为争取生存权利而斗争	194
第十三章	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200
一、	抗暴运动	200
二、	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204

三、工人运动进一步开展·····	208
第十四章 国民党残酷统治的加剧和北平人民反迫	
害、争生存的斗争 ·····	211
一、“四月风暴”·····	211
二、反美扶日运动·····	223
三、迫害和反迫害的抗争高潮·····	225
四、北平各阶层人民反饥饿争温饱运动·····	231
第十五章 为和平解放和顺利接管北平而斗争 ·····	237
一、华北战场军事形势的迅变·····	237
二、护厂护校斗争与社会调查工作的全面开展·····	239
三、为北平的和平解放而斗争·····	244
后 记 ·····	249

第一章

五四运动前的北京

一、世界著名的古都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边缘，北有军都山，西有西山；永定河、潮白河及北运河流入境内；距海100多公里。距今大约50万年前，北京人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和繁衍。相传黄帝和蚩尤曾在北京附近打过仗。西周初年燕召公的封地称为“燕”，燕的都城位于今房山县琉璃河镇东面的董家林村。战国时代的燕国首都薊城，就在今天北京外城广安门以北的地方。公元前3世纪初，秦始皇并吞六国后，薊城成了天下六十四郡之一的广阳郡的治所；直到唐朝末年，它一直是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北京居民通过古北口、南口，与山后的游牧民族发生经济联系。隋唐五代时期，北京为幽州。契丹族阿保机建立的辽政权，占据此地改称为南京。女真族建立金朝，取代辽的统治，迁都燕京，改名为中都。金朝统治者完颜亮动用了80万民夫和40万士兵兴建中都新城，周围35里。蒙古族崛起，成吉思汗建立了跨欧亚两大洲的大帝国，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并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不久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大都成为全国唯一的政治中心。元大都的建设，先后历经20多年，财政开支巨大，城墙周长60多里，人口约50万。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入大都。1402年开始建筑目前的北京

城；19年后北京宫殿告成，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明嘉靖年间，又修建了南面的外城。清入关后，对北京城本身没有多大修建只，是更多地兴建园林。北京城威严雄壮，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二、鸦片战争后北京人民的 反帝反封建斗争

自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以后，北京与全国一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北京人民遭受奴役，不断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853年10月太平天国农民军北伐抵天津附近时，北京市民和郊区农民曾经给予热烈的支持。封建统治者表现了极度的恐慌，咸丰皇帝已经做了逃亡的准备，下令各省督抚将应解到北京的税收送到热河行宫。官僚豪绅逃离北京的不下3万人。1895年5月，康有为率领18省1300名举人，齐集松筠庵开会，联名上书皇帝，反对清政府批准卖国条约（即《马关条约》），要求拒和、迁都和变法。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也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学生运动。1900年，北方农民起来组织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农历5月初，义和团进入北京，到处设坛棚，赶制刀枪，北京城里的达官贵人的仆人、车夫，纷纷参加了义和团。他们同市民一起积极参加攻打外国使馆及西什库天主教堂的活动。义和团虽然控制了北京的局势，却没有夺取封建政权的打算。他们组织涣散，没有领导核心，终于为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所绞杀。

辛亥革命发生后，北京人民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12年1月16日革命党人张先培等三人在东安门外的丁字街行刺袁世凯，由于投掷炸弹不中，被捕遇难。1916年，法帝国主义强占天津老西开地区，企图扩大天津法租界。天津人民在天津商会的领导下，进行反抗法帝国主义的斗争。北京人民为了支援天津

人民的正义行动，曾多次集会，抗议法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并且开展抵制法币、法货和法国招募华工的斗争。北京人民随后在宣武门大街的江西会馆成立了全国公民会，并派代表到各省区联络，声援天津人民的斗争。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北京人民虽然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进行了多次顽强的反抗和英勇斗争，都由于缺乏正确的组织领导，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失败。

三、北京近代资本主义企业 和产业工人的出现

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促进了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从全国范围看，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企业是在19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北京地区近代机器工业出现的要更晚些，而且规模较小，产业工人比沿海城市上海、广州等地少得多。1879年，中国商人段益三在门头沟创办通兴煤矿。1898年，美国资本侵入了门头沟地区，美人施穆侵吞了华商股份，并采用机器生产，煤块提升使用绞车，排水使用水泵。1883年，清政府创办了神机营机器局（即兵工厂），使用现代机器制造枪炮。1901年至1906年，外国资本家和清政府先后在京汉、京绥铁路沿线，陆续创办了一些企业，如长辛店机车修配厂、南口铁路工厂等。长辛店机厂（修配厂前身）开始只有一间厂房和一台50马力的发电机，工人有二三百人。1905年，民族资本家相继开办了丹凤火柴厂、京华印书局（实际上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北京的一个印刷厂）和华商电灯公司。据1914年的调查，丹凤火柴厂有各种现代机器近50台，雇佣男女工人1000多

人，每年获利10万元，产品经销北京及京绥、京汉两条铁路沿线各地。1907年清政府陆军部出资并招揽私股，在清河镇创办溥利呢革公司，专制军毯和军呢。1908年清政府设立专印钞票的度支部印刷局，同年又设立京师自来水公司。1910年，又建立民族资本的贻来牟和记面粉厂。辛亥革命前，北京近代产业工人已有几千人。

在1914年至1918年欧洲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相互火并，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北京地区工业企业得到发展，特别是轻工业的面粉、造纸、织布以及地毯等行业的新厂不断出现。1915年，建立了民族资本的双合盛啤酒厂，振兴制革厂也在欧战期间建立。欧战结束，洋货充斥中国市场，北京地区的民族工业又遭挫折。北京产业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本民族资本的发展而发展的。

北京产业工人同全国工人一样，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资本家的三重压迫，因而富于彻底革命精神。北京工人受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更为突出。北京许多工厂名义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内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封建剥削十分残酷。正如《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所说，“这里的厂主和雇主就是政府本身”。京西煤矿有一种叫“关门屋子”的工人，这些工人没有工资，没有衣服穿，没有任何自由，实际是一种现代奴隶。北京地区工厂中的包身工、养成工、封建把头制比比皆是，超经济剥削是大量存在的。因此，反对封建性的剥削和压迫是北京产业工人的一大艰巨任务。

北京产业工人人数少。直到1919年约有2万人左右，不到当时北京市人口93万的3%。但北京的产业工人比较集中，例如长辛店有3 000人，丹凤火柴厂有1 000人。由于集中，弥补了人数不足的弱点，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团结和战斗。北京现代产业工人虽少，但加上建筑工人、人力车夫、水夫、市场苦力以及店员、手工业

工人（如玉器、绒花、漆器、景泰兰，象牙雕刻等），有几十万人，数量相当可观，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产业工人多数来自农村，因此同农民有着广泛的天然联系，这就使产业工人在历次革命斗争中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

四、北洋军阀的统治中心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帝制，但是由于革命不彻底，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两座大山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肩上。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在北京演了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他为了坐上封建皇帝的宝座，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袁世凯在北京做了83天皇帝，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取消帝号，闷闷而死。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各国扶植各派军阀势力，争夺地盘，攫取北京中央政权，造成连年混战。1917年6月，军阀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所谓“府院之争”的矛盾，带兵4000人进入北京，抬出溥仪复辟帝制。随后北洋军阀段祺瑞又以“恢复共和”为名，赶走张勋，独揽北京的中央政权。五四前的北京，处于反动、黑暗和动乱的时间。

（1）北洋军阀政府实行反动军事独裁的统治。1914年3月，军阀政府公布了《治安警察条例》，同年底公布了《出版法》，次年4月又公布了《报纸条例》。其中规定凡涉及“淆乱政体”、“妨害治安之内容”一概不准登载，违者重罚，从而彻底剥夺了人民群众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等一切权利。军阀政府疯狂地实行扩军备战，军费成倍增加。1914年全国陆军只有45.7万人，1918年增加到85万人，4年增加近1倍。1918年的军事预算达2亿元以上，

为辛亥革命前夕即1910年的1亿元的2倍。这些军事预算，无疑是摊派在每一个老百姓头上。当时军费的实际支出，竟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70%左右，在世界各国及中国历史上都是少有的。国家财政不足，北洋政府又大量削减教育经费和其他事业经费。例如1919年初，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削减了北高师、法专、医专及农专等高等学校的教育经费，并且扣发了上述各校教职员工的薪金。教育经费和教职员工的薪金本来很少，政府一再减少和扣发，引起北京教育界的极大不满。此外，军阀政府还以国家主权为抵押，大借外债，仅1913年至1919年八年期间，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182项，8亿多元；其中段祺瑞政府在1917年8月至1918年9月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就向日本帝国主义借款达5亿元。

(2)军阀政府的疯狂掠夺，使北京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日趋恶化，工人们不断起来斗争。在京郊，军阀、官僚、地主及豪绅，对农村土地实行大量兼并，无限制地提高地租，并且采用各种形式的高利贷盘剥农民；加上接连不断的天灾、兵祸，结果耕地大片荒芜，农民纷纷破产。北京城内外的工商业，虽然在第一次欧战期间有较多的发展，但在苛捐杂税、战祸频频的情况下，市场呈现萧条，大批的工商业破产。根据北京《市政通报》统计，自1917年10月至1918年5月的8个月的时间内，北京倒闭歇业的大小商号就达2 247家。1918年12月15日《晨报》刊登一条夜市营业萧条的消息。该报写道：“前门大街及西珠市口各地，夜市近来因受纸币之影响，一切营业非常萧条，摆设一夜不名一钱者。”“歇业者颇为不少，并已公呈警厅，请每月酌量减徵，以示体恤。”城市贫民与日俱增，外城內城20个区的调查，无米为炊、亟待救济的极贫户达15 689户，计65 434人。1919年1月7日《晨报》第6版记载：“京师近年市面萧条，人民生计艰难无衣无食者触目皆是。官厅虽谋救济，苦于无米为炊，……倘有慈善家衷怀感触起而拯之。”实际数字不止1万多户，政府已经无力

救济。第二天《晨报》又发了一条消息：“停止领衣售卖。”京师警察厅说：“贫寒户所领棉衣系自官署捨放”，“而贫民窘于一时竟有将衣服变卖易资，日后仍然受冻”。同一天《晨报》还说：“贫儿半日学校，自近年来贫儿就学人数日见增加。现各区贫儿学校共56处，贫儿就学人数5860名。”贫民无衣无食，当然没有钱上学。警察厅办的贫儿学校是救济性质，不收学费。同年1月10日《晨报》还登了一条“习工厂妇女择配”消息，报道说：“区域石碑胡同京师警察厅妇女习工厂，现有良家妇女冯王氏等11名，因无家可归，情愿择配，欲领作妻室者，速到该厂报名处接洽，并无费用。”《晨报》还登了一条北京乞丐多的消息，报道说：吾国游民之多，为世界冠。京师一隅此类尤夥，盖一则因实业不振，一则因生活指数增高，再加京畿一带水溢频繁，灾民逃难来京沦为乞丐。记者昨日偶过顺治门内东顺城街一带，所见男女老幼乞丐，几近百人，大都衣破褴褛，沿途向人行乞，叫苦不休，其一种可怜之声状，令人不忍见闻。几则短短的消息，反映了当时北京人民的苦难。

北京工人阶级身受三重压迫和剥削，生活日益恶化，他们忍无可忍，起来进行斗争。1910年，清河镇的溥利呢革公司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1913年11月，北京邮政工人为反对强行增加送信班次，全体工人举行罢工。北京邮政总稽查马玉昆将首倡罢工的工人开除，并另召237人代替，邮政工人继续坚持斗争。北洋政府财政部印刷局有工人1700多人，其中印刷、完成两科300多名徒工要求发放年终花红及增加工资，于1916年3月4日开始罢工。当局出动军警800多人镇压。在罢工斗争中，工人被捕和受伤者达20余人，但是厂方在广大工人压力下，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部分要求，这是北京最早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自发的经济斗争。

五、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封建军阀的残暴统治，激起了广大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强烈要求。1915年，在我国以北京为中心掀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同年9月，由陈独秀主编的第一个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青年》杂志创刊。次年9月改为《新青年》杂志；年底编辑部由上海迁来北京。它一开始就提出了反封建主义，主张民主主义的口号。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号召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北京许多激进民主主义者，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反对君主专制政治和封建旧礼教、反对为封建主义制度服务的孔子学说，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和自由、民主的社会伦理观念。因此，北京出现了以《新青年》为中心的以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为基本要求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1913年6月，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声称“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1916年秋，袁世凯死后，保皇党首领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并列入宪法。草拟宪法明文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于是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新青年》上发表批驳孔学的文章，如《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袁世凯复活》、《再论孔教问题》、《尊孔与复辟》等一系列文章，反对康有为，批判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

1916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发表了《青春》一文，批判了保守的封建主义，主张创造民主、新生的“青春中国”，他指出：第一，“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宁容讳。”第二，“青春中华”再生是历史的必然。只要人民努力，“白首中华”可以变为“青春中华”。第

三，“白首中国之死，青春中国之再生”，唯一办法是“革命”。因此李大钊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站在反封建、坚持民主、自由的最前列，为创造“青春中华”而战斗。1917年初，他在《甲寅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孔子学说和封建伦理的文章。李大钊在《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以及《宪法与思想自由》等文章中，尖锐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他认为“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假如“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且倡民权自由之大义，亦未可知”。现在有人抬出孔子，“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

1917年春，北京广和楼剧场演出宣扬封建旧道德的新剧《自由宝鉴》，一时轰动全城。该剧描写一对青年男女，不顾家庭和社会的阻拦，自由恋爱并且结婚。婚后为盗匪所骗，走投无路，双双自杀而死。临死时“忏悔自语”，不该误听自由新说。李大钊看了该剧后非常气愤，认为它完全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他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了《不自由之悲剧》一文，强烈抗议该剧的演出，指出如此剧中所陈者，确实为不自由之结果，确实为社会不公允之所致，家族专制之所迫，而与自由婚姻无关。又说：“今该剧之精神，乃归咎于自由，此种逆乎时代潮流之演剧，固足以代表目今中国社会之旧思想”，最后，他“忠告广和楼剧主，对于斯剧速加改良，勿使流毒社会”，并且“希望具有新思潮、新理想之文学家、美术家”，对于此剧“加以严正之批评”。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也起了极为显著的作用。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论文、小说、杂感等30多篇，文章内容充实，文笔精

炼犀利。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吃人”旧礼教，无情地鞭挞了封建家族制度的罪恶。

《新青年》还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主张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陈独秀最后提出在文学革命中，“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认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他主张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他宣扬实用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当时用实用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在客观上却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当他用实用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俄国十月革命及中国革命，则起了极坏的作用。

维护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他们肆无忌惮地抵制和攻击新文化运动。林纾（又名林琴南）公开攻击新文化运动。他在上海《新申报》上开辟《蠡叟丛谈》专栏，以文言文、杂谈和小说为手段，先后写了小说《荆生》、《妖梦》等，宣扬封建伟丈夫借用政治势力，打击和抵毁新文化运动及其宣传者，还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了他给蔡元培的公开信，污蔑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是“引车卖浆之徒”，是“禽兽”，胡说宣传新思想是“叛亲灭伦”、“伤天害理”。

1919年3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把封建卫道者们批得体无完肤。他说“我今正告那些顽固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一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你们若是对于公众失败，那